

李良玉 著

变动时代的 记录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变动时代

李良玉 / 著



BIANDONGSHIDAI DE
JLU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变动时代的记录

著 者	李良玉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编辑	谷艳秋	责任校对	白 修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39-4/K·168
定 价 2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1	史 革 的 思 维
3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21	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
39	近代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
45	文化的分层
49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
52	关于国家的札记
57	实验主义的真理观没有过时
60	加强对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研究
66	驳“文明冲突论”
73	通过改革推动社会进步
76	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88	最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研究
91	中西融合出新知
96	新世纪献词

97	偶然事件的必然意义
99	公民道德与法治社会
101	建设现代文明与五个并举
104	培养说真话的习惯
107	加强区域现代化的研究
114	努力建设诚信的社会
124	社会分层与社会进步
136	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当代史的研究
149	民国史研究
151	论民国时期的关税自主
169	论《五五宪草》
184	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变化
194	总理、总理纪念周和国父
198	1927年之前的几部民国宪法文件
206	《外交部关于收回威海卫租借地案报告》 形成时间考订
210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
222	冯玉祥敦促武汉分共“马电”有关郑州会议 内容考释
232	王朝末世的辛辣讽刺
239	对日本一个大学生访问团的讲演和答问
246	记载 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 的四个文本
259	茅家琦教授主编《孙中山评传》书稿审查意见
278	孙中山研究的新成果

283

社会史与方法论

285

当前妓女问题研究

303

妓女问题社会调查

332

读史笔记：历史上的妓女

336

宣传学术 传递信息

338

《花县党史通讯》阅评

341

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概述

357

邪教的特点及其与宗教的区别

359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381

关于培养博士生的设想

383

地方通史的编撰方法

391

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应当注意的几个要点

401

学术评语选

429

回忆录与诗词

431

回忆 1976 年南京“三二九”运动

443

一张老照片和四个知青的命运

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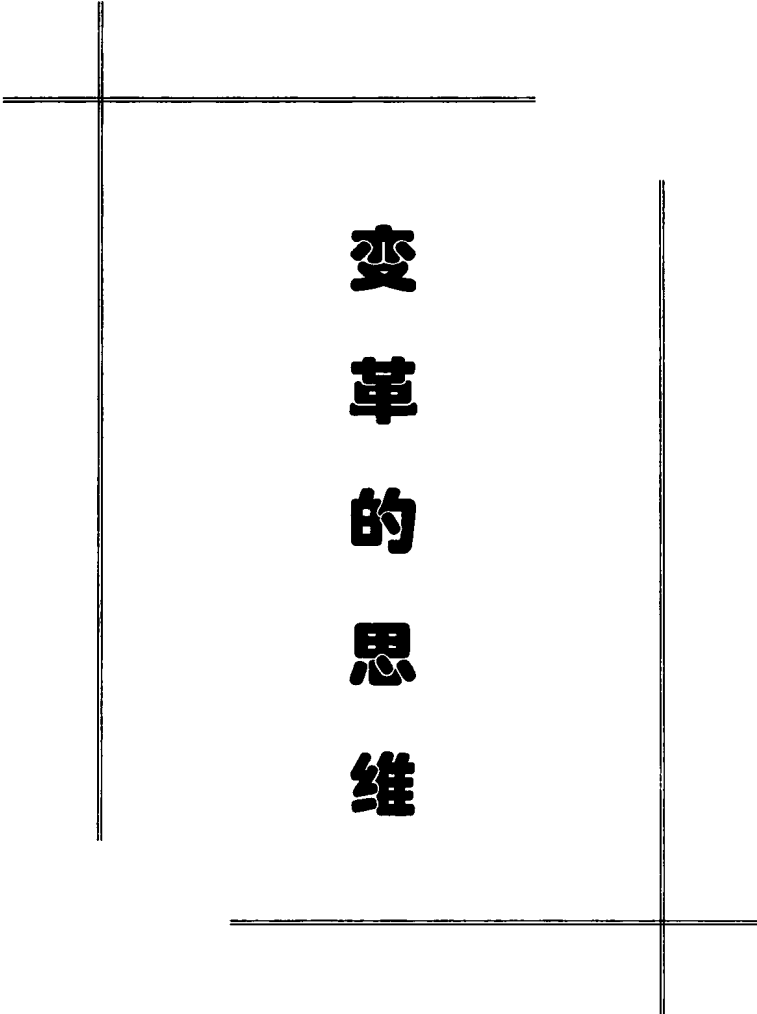
十八年来的师生情

464

诗词

470

后记



变革的思维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断代的概念。历史本来没有断代，它是人类活动及其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人类、时间和空间都是恒在的，因此，所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区别都是历史学家依据某种主观的标准，为了强调某种时代因素或社会特征的重要，也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划分的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不少西方学者采用的方法，主张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据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来华是 1598 年；第二次是 1602 年，这次住了十年。其后又有不少人来华。这类事情某种意义上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然而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仍需讨论。第二种方法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多数中国学者采纳这个看法。例如，吕思勉 1926 年所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把中国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从史前到秦统一；第二，从秦至欧人东来，亦即上文所说的明代中期。政治上指 1516 年葡萄牙人到广东，1535 年占澳门；文化上则指 1598 年利马窦来华传教。第三，欧人东来之后，即明代中期以来，是为近代。他

认为，中国近代可分做两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戊戌，二是戊戌以后。第一个阶段是外力压迫之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同时，他承认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①，在后来的其他著作中，他还说过：“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②从1943年上溯100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五口通商之明岁。此百年中，为中国历史变动极剧烈之时代”。^③吕思勉强调了中西文化会通的意义，点明了其中存在的冲击反应关系，肯定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标志作用。

1938年5至6月，蒋廷黻写了《中国近代史大纲》，时间跨度是从鸦片战争到1926年。该书构思于抗战以前，原拟花10年功夫写到抗战。他认为，近代中国所以失败，一是由于科学不如人，二是没有工业化，三是大一统下面缺乏竞争性、民族心和爱国心。所以，近百年的中国只有一个问题，即能否近代化。这个视域体现了他的外交家的政治眼光，也是一种深刻的史学见地。60多年后有人不无抬高地评价说：“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④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也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该书初稿写于1930年秋天，1932年完成，1933—1936年曾三次修改。

此外，1958年出版的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62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都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另一个学术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

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毛泽东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他认为，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变化。近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关于近代史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过程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五十年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毛泽东的上述看法。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也有不同说法，毛泽东关于区分新旧民主革命阶段的论点是造成分歧的依据。

毛泽东认为，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社会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⑤他指出，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它就不再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革命发生转变的呢？毛泽东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⑥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已经走向崩溃；苏俄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并且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以，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属于新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就中国的内部条件而言，五四运动以来也有新的时代因素，即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革命的政治势力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等等。

在以上论述中，出现了近代、现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后来由此演绎，形成了以五四区分近代史、现代史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术框架。

四十年代延安出版的《中国现代史》，1950年3月出版的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62年出版的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都是从五四开始的。早在1945年，范文澜在延安就着手写中国近代史，原打算把1840—1949年分为新旧民主革命上下两编。后来只从鸦片战争写到义和团运动，1947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出版。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以五四为分界。

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具有突出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了1919—1949年的三十年党史。它圆满贯彻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理论观点，按照联共（布）党史颂扬列宁斯大林的写法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党的正确路线代表者的地位，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党史分期意见（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这本书成为相当长的时期内所有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著作的范本。1952年8月，胡华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十一版所写的后记中说：“尤其是去年6月以来，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先后出版，使本书的修订更加有了依

据。”^⑦

对于以五四划分近、现代史的主流做法，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

1955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再版。他在《九版说明》中指出，“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所以本书改称“《中国近代史》上册”。范同时强调：“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⑧这里是在含蓄地坚持近现代社会性质的一致性。1959年8月，李新等人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明确主张划分通史的依据是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称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称为现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称为现代史是个“比较合乎习惯但却不合乎科学的名称”。^⑨

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中，包含着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能否把明代中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应该说总体上依据不足。那时传教士主要是传教，传教活动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可是基督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基督教产生于古代，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合法宗教，所以并非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如果说异文化交流，那么汉唐之际佛教的传入影响远甚于此。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为了取得倾销鸦片的权力。就历史影响而言，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不取决于是否有基督教流入，而决定于打破了闭关锁国，建立了比较确定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关系，通过除了鸦片之外的日渐扩大的贸易，造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直接交流。同时，由于外力的打击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屈辱

地位，也刺激了内部的反应，史无前例地积累和调集了本身的能量，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这些方面的重要变化，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标志性开端，应该可以成立。

第二，近代中国的“两个过程”是否就等于近代史的内容？建国初期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的论断，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近现代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自然成为近现代史的主要线索。几十年来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关上述历史事件的成果非常丰富，深化了人们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认识。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对近代史的线索问题进行了反思，有关研究成果也对近代史的内容有所拓展。可是应当承认当初以两个过程论规范近代史，至少在指导思想上具有很大局限性。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在讨论近代革命运动的时候提出来的，其主旨是阐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它概括了近代革命运动的本质，并未直接规定近代史的内容。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曾号召对近百年来历史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专门研究，再作综合的研究。可惜人们为了强调阶级斗争观点而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疏忽了。现在看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化，或者说把中国强制纳入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因此，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近代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全部。

第三，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可否理解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毛泽东所讲的近代是指近时代，即与古代

相比稍近一些时候的；现代是指现时代，或者叫当前时候的，究其语意并不能解释为近代史和现代史。例如，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实际上是指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理解为现代史上的孔夫子。因此，不能把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近代的和现代的”作为严格的历史学断代概念。

第四，毛泽东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理论可否作为区分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依据？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权理论。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新旧民主革命并没有重大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联系，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充当革命领导者，和革命成功以后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一种政治理论而非史学理论。依据这一理论，革命的指导者可以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但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却不应照此类推，把近代 110 年分为两段。

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把专史的分期方法和通史的分期方法区别开来。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等专史的时候，过去的近现代史分期仍有参考价值。作为断代史，也可以把近现代史分别纳入清史和民国史。但是，作为通史，应该考虑有一个新的分期方法。

笔者主张，把近代 110 年分为五个阶段，即 1840—1861；1861—1894；1894—1912；1912—1927；1927—1949。

1840 年至 1861 年是第一个阶段，这是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激烈冲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中西冲突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肮脏的鸦片贸易攫取中国的财富，甚至通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扩张和极端

民族主义的血腥性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妄自尊大的政治传统和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满清政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闭关自守又根本背离时代潮流。鸦片泛滥的最根本原因是满清政权的腐败。在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之后，满清政府至少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面对世界，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因此，1861年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这一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奕訢奏请设立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冯桂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术”的主张。这一切标志着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起步。

1861年至1894年是第二阶段，这是洋务运动最见成效，也是清政府自强自救的阶段。通过洋务派的艰难实践，中国的物质技术水平和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和日本大致不相上下的程度。令人遗憾的是，甲午一役，竟至空前溃败，丧权辱国，史无前例。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的政治基础空前削弱。三十多年的努力顷刻瓦解，付诸东流，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是否有能力应付时局。

1894年至1912年是第三阶段，这是清政权由于内部改革派政治维新失败而被辛亥革命推翻的阶段。甲午溃败使传统政治秩序发生危机，大批科举知识分子奋起救亡图存，庶人不准议政的教条被打破。知识分子和光绪帝、改革派官员相结合，企图通过变法维新力挽狂澜。但是，维新派改革科举的主张可能堵死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变官制裁衙门的计划将使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员失去权位，而维新派全力拥戴光绪帝变法图强的结果必然会让权欲极盛的西太后真正远离权力中心。戊戌变法时期表现出来的是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满汉之争，而骨子里的矛盾只是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戊戌政变表明，传统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无法灵敏地表达国家整体

利益的需要，无法避免由于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而引起的冲突乃至选择不当；无法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实施正确决策，集中意志，凝聚民心。戊戌政变打掉的不仅是变法运动，还有民众的政治热情，清政权的政治信用和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理障碍。利用义和团来打击各国在废除光绪帝问题上的不合作，是西太后实行的最为祸国殃民的政策。固然应当谴责八国联军之役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满清政权的昏庸愚蠢肯定是引起这场灾难的主因。走到《辛丑条约》这一步，无论是从社会心理上，还是从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上，满清政权的覆灭都已无法避免了。辛亥革命是近代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民族民主革命。

1912年至1927年是第四阶段，这是革命党人创建民国但由北洋军阀接管统治的时期。民国的建立是近代社会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君主世袭制度，成为走出王朝循环的周期性历史怪圈的起点。出现两次短命的复辟、短暂的军阀专权和混乱是必然的，因为传统过于强大的规范力失去以后，新的社会规范有一个建立和调适的过程。同时，民主革命与民主共和的实现，在当时更多地体现为近代知识阶级思想革命的成就，而缺少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经济法则和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经验作基础。十月革命使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成为俄国的现实，它的传入，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增加了新的目标，也发现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力量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工农革命的高涨又是造成统一战线破裂的重要因素。

1927年至1949年是第五阶段，这是国民党人取代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国共两党的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国民党人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建立了五权宪法的国